

嫉妒的伦理阐释: 论朱利安·巴恩斯《她过去的爱情》中的脑文本与伦理选择

An Ethical Interpretation of Jealousy: On the Brain Text and Ethical Choice in Julian Barnes's *Before She Met Me*

汤轶丽 (Tang Yili)

内容摘要: 在小说《她过去的爱情》中, 朱利安·巴恩斯聚焦恋情中的嫉妒, 围绕主人公格雷厄姆面对嫉妒时的心理状态和所做出的选择, 讲述了一则关于斯芬克斯因子变化与冲突的寓言。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来看, 格雷厄姆身上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引发了理性意志和非理性意志之间的冲突。格雷厄姆肆意猜忌妻子出轨, 形成了背叛和愤怒的脑文本, 导致其身上的兽性因子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在非理性意志的驱动下, 格雷厄姆做出了刺杀好友杰克以及自杀的伦理选择。通过书写嫉妒, 巴恩斯揭示了伦理道德之于人类生活的规范和指引作用。

关键词: 《她过去的爱情》; 朱利安·巴恩斯; 文学伦理学批评; 脑文本; 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 汤轶丽, 文学博士,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当代英美小说研究与叙事学。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 19ZDA292】以及2019年度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一般科研项目“巴恩斯小说的伦理叙事研究”【项目编号: Y20194158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研究同时得到第66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2019M662098】的资助。

Title: An Ethical Interpretation of Jealousy: On the Brain Text and Ethical Choice in Julian Barnes's *Before She Met Me*

Abstract: In *Before She Met Me*, focusing on jealousy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the psychological portrait of as well as the choices made by Graham Hendrick in the face of this feeling, Julian Barnes writes a fable about the changes and conflicts of Sphinx factor. Adopting a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different combina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hinx factor in Graham's psyche trigger conflicts between his rational and irrational will. Graham's illusions and suspicion of his wife's adultery form the brain text of betrayal and

anger, which leads to the uncontrollability of the animal factor in him. Driven by the irrational will, Graham makes an ethical choice to kill his good friend Jack and to commit suicide. Through the story of jealousy, Barnes reveals that human life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moral principles.

Key words: *Before She Met Me*; Julian Barne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rain text; ethical choice

Author: **Tang Yili**, Ph.D. in Literature, is Postdoctoral Fellow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 scholarship includ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contemporary Anglo-American fiction, and narratology (Email: milkytang2008@126.com).

自第一部小说《伦敦郊区》(*Metroland*, 1980)问世以来,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始终关注爱情、记忆、历史、死亡、衰老以及婚姻等个人生存的话题,以睿智和冷静的笔触揭示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其中的一条主线,爱情这一看似“老生常谈”的话题在巴恩斯建构的故事世界中焕发新彩,并成为了作者省视自我,叩问存在的载体。在其第二部小说《她过去的爱情》(*Before She Met Me*, 1982)中,爱情的基调似乎更为黑暗和讽刺。巴恩斯在采访中承认到:“(这一部)小说着实令人不快,它讲述了不愉快的性体验,嫉妒以及无法摆脱的情感”(Smith 74)。《她过去的爱情》充满了浓厚的巴恩斯风格,描绘了日常生活中最普通不过的情绪,聚焦于“爱情的病症”——嫉妒。小说讲述了中年男子历史学家格雷厄姆在经历多年失败的婚姻后出轨。当他终于与前妻芭芭拉离婚,如愿与现任妻子安开启甜蜜美好的新篇章时,却在前妻的刻意安排下观看了安曾经出演的爱情电影,从此陷入了嫉妒的漩涡,不能自己。安的年轻貌美与相对丰富的感情史使格雷厄姆变得疑神疑鬼。他反复不止地观看安曾经参演的电影,找寻她背叛的证据,并在好友杰克的小说中找到了安与杰克出轨的蛛丝马迹,一遍遍地幻想二者私通的画面。格雷厄姆脑中的猜忌、质疑和幻想在巴恩斯黑色幽默的笔下纤毫毕现,并在结局中得以爆发。在刺杀杰克后,他最终自杀解脱。相较于巴恩斯其他作品,《她过去的爱情》的叙述显得更为直接,更侧重精神和心理的刻画。虽然延续了第一部作品关于嫉妒这一主题的探讨,但巴恩斯在这部作品中对于这一主题显然更加野心勃勃,满是戏谑和狡猾的腔调,将受困于庸常生活的情感困境和道德悲剧放大至无以复加的地步,进而掰碎至读者面前。

尽管《她过去的爱情》在评论界并未得到过多关注,但大部分批评者们都指出并探讨了小说中对于嫉妒这一主题的刻画。大卫·蒙特罗斯(David Montrose)和彼得·查尔兹(Peter Childs)等评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巴氏笔下的嫉妒是在性解放时代下催生出的病症(Montrose 69; Childs 34)。换

言之，这一部小说是巴恩斯对于 20 世纪 60 年代挑战传统性观念和性道德运动的反思。弗雷德里克·莫内龙（Frédéric Monneyron）以及马克·米灵顿与艾莉森·辛克莱（Mark K. Millington and Alison S. Sinclair）则分别从精神分析视角和性别视角探讨小说中的嫉妒机制。莫内龙认为格雷厄姆的嫉妒来源于婴儿期，产生于对母亲的理想化以及阉割威胁（Guignery 23），其嫉妒病症符合了弗洛伊德的范式。事实上，小说确实充满了作者巴恩斯对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思索。在格雷厄姆自身对于嫉妒的分析以及与杰克类似患者和治疗师般的对话中，巴恩斯展示了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思考和戏谑。与莫内龙的解读相呼应，米灵顿与辛克莱认为，安较为丰富的情感经验使其成为一个“母亲式”的形象，从而使格雷厄姆对自我的控制感出现问题。格雷厄姆最终的暴力行为反应了父权制社会并不能解决男性的问题，甚至试图控制或否认这些问题（Millington and Sinclair 15）。上述学者对于嫉妒这一主题的分析无不显示巴恩斯笔下的嫉妒，更像是作者观察生活和人性的一种独特的视角。巴恩斯把观察者格雷厄姆置于嫉妒的精神状态中，把他脑海荧光屏上不断闪现的画面、场景转化为语言及行动，将人物嫉妒的精神状态和精神表现描摹得淋漓尽致且充满荒诞感。就此而言，格雷厄姆的感情活动是强烈甚至偏激的，具有复杂的情感内容、心理内容、文化内容以及伦理思想内容。小说书写的是嫉妒，但却不仅仅止于嫉妒。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来看，小说中的嫉妒主题是作者探索头脑的伦理功能的载体。巴恩斯通过描写嫉妒状态下格雷厄姆有关背叛和愤怒的脑文本的形成和演绎，以及在此基础上做出的伦理选择，展现了思维和情感过程中斯芬克斯因子与脑文本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从而引导读者形成正确道德行为的脑文本，实现文学的道德教诲功能，表现了小说家的伦理立场和人文关怀。

一、嫉妒的伦理意义与阐释

“嫉妒”（jealousy）作为人类普遍的情感体验，并非个人能得已轻易消磨，正如赫尔穆特·舍克（Helmut Schoeck）所言：“一个人要借助于自身取得的个人思想上的成熟来战胜本身的嫉妒，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赫尔穆特·舍克 9）。事实上，嫉妒不仅仅涉及爱情，社会中的任何人际关系都有可能为其提供温床。在现有关于嫉妒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都将研究锁定为亲密关系中的情感，即爱情嫉妒。本文也将对嫉妒的探索定位至爱情关系中的嫉妒，以便更深入地探讨。翻阅嫉妒的历史卷轴，我们不难发现，嫉妒与其他情绪情感一般具有“多样性”。它囊括了丰富的哲学、文学以及伦理含义。同时它具有“跨时代性”和“跨文化性”。人们对于嫉妒的理解和认知有着深刻的伦理性，并随着伦理关系和社会内容的变化而不断演进。对于嫉妒伦理意义的探寻，文学则是最好的载体和表现艺术。

嫉妒作为文学作品中的主题古已有之。在《她过去的爱情》中，巴恩斯

的嫉妒书写大致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作品中所表现的嫉妒的导火索或者这一类情感体验的支点往往是微不足道、细小且平常的。在《她过去的爱情》中，安曾经主演的电影成为了嫉妒感情的落脚点；二是由此支点所引发嫉妒的情感活动却是强烈、亢奋甚至偏激的，具有复杂的情感、社会和伦理思想内容等。格雷厄姆的嫉妒之火使他成为了大脑的敌人，深陷于想象的猜忌或妄想的漩涡中；三是情感状态的亢奋和强烈往往会伴随情感者一系列的伦理选择，继而引出激烈甚至极端的行为。格雷厄姆深陷于“当大脑成为自身敌人”的困境中。在真实与虚构，理性主义与理想主义，自然情感与理性情感之间，他不得不做出一系列的伦理选择。

就此而言，在解读文学作品中嫉妒这一母题时，文学伦理学批评成为了我们分析嫉妒的一大利器。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体系中，文学中的精神或心理分析基于“脑文本”（*brain text*）这一概念，它“以人的大脑为载体，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形态。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感知和认知，先是以脑概念的形式在大脑中存储，然后借助脑概念进行思维，从而获取思维的结果：思想。思想是大脑在感知、认知和理解的基础上对客观事物或抽象事物进行处理得到的结果，这个结果只要在大脑中存储，就形成脑文本”（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 30）。作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概念，脑文本“给我们提供了深入分析精神的可能。从认识论角度看，只要有精神存在，就一定有精神存在的形式，只要有精神存在的形式，就可以对精神进行分析。精神的存在是以脑文本为前提的，没有脑文本，就不可能有对精神的认知。对心理的分析也同样如此。人的心理活动也是以脑文本为载体的，没有脑文本，心理活动就不可能存在。因此，无论精神分析还是心理分析，都要转移到对脑文本的分析上来”（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 33）。有鉴于此，格雷厄姆的心理活动是以脑文本为载体，并以此决定了他的意识、思维、判断、选择、行动、情感、伦理和道德等。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解读或阐释格雷厄姆的嫉妒时，对其脑文本的解构和分析是必不可少的。格雷厄姆的大脑根据不同的伦理规则不断对嫉妒、出轨、愤怒等一系列情感体验和感知的脑文本进行组合和修改，从而对其本身发生作用，使意志和情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同时，格雷厄姆身上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也导致了不同的意志表现，进而影响脑概念的组成和变化，最终影响了脑文本的生成和演绎。形成的脑文本也将影响格雷厄姆身上斯芬克斯因子的组合和变化，并决定了他的伦理选择。“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人的伦理意识开始产生，善恶的观念逐渐形成，这都是脑文本发生作用的结果”（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 33-34）。此外，在作家与读者层面上，作家在将对于嫉妒的感知、认知、理解和思考的“文学脑文本”（聂珍钊，王永 172）解码成书写文本的过程中做出了一系列的伦理选择；读者则通过阅读文本，从中获取形成相应的脑文

本，并从而完成自己的伦理选择。这一系列脑文本的转化也完成了文学的教诲功能，使得嫉妒这一系列情感体验通过文学的载体实现艺术化和伦理化。

二、《她过去的爱情》中的脑文本与伦理选择

在回答为何选择嫉妒作为小说的主题时，巴恩斯的答案颇具兴味。他认为作为小说的主题，嫉妒因为其“戏剧性”而具有“小说般”的吸引力，它通常是“非理性的、不公平的、无穷尽的、痴迷的且恐怖的。（嫉妒作用时）埋藏在我们深处的原始力量打破了我们所谓成年时期的表面，就像池塘里鳄鱼的口鼻。”（Guppy 157）那么巴恩斯口中的“原始力量”以及“鳄鱼”又代表了什么呢？在小说引语中，巴恩斯便给出了答案。他援引了保罗·麦克莱恩在《神经与精神疾病杂志》中关于“三个脑袋”的论断：

人类发现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地：自然本质上赋予他三个脑袋，尽管它们结构迥异，但必须共同运作、相互交流。最老的那个脑袋基本上是爬行动物型的，第二个遗传于低等哺乳动物，第三个是晚期哺乳动物的进化，正是它……才使人成为独特的人。当我们以寓言的方式讲述这些脑中之脑的时候，不妨想象精神病医生叫病人躺在长榻上时，他是要他伸开四肢躺在马和鳄鱼旁。¹

麦克莱恩论述中“三个脑袋”的存在以及共同运作事实上与斯芬克斯因子中人性因子（human factor）和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的不同组合与变化有异曲同工之处。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人类在经过生物性选择之后还需要再经历第二次选择，即伦理选择，方能获得人的形式。由此可见，从“第一个脑袋”到“第二个脑袋”，人经历了生物性选择，奠定了人类向更高阶段进化的基础；从“第二个脑袋”到“第三个脑袋”，人类经历伦理选择，从而真正使自身与动物区分，成为真正理性的人。在此过程中，人即使脱离了野蛮状态，经历了“第二个脑袋”到“第三个脑袋”的过程成为了文明人，但身上依然保留动物的特性，也就是巴恩斯和麦克莱恩口中的“马与鳄鱼”。巴恩斯在解释为何引用“三个脑袋”的论断时强调道：“（此论断）契合小说的主题……讲述了一个文明的人，发现马与鳄鱼并未消失。正因为这种持续的爬行动物的头脑，事情便从乐观走向了完全的悲剧”（Freiburg 55）。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并存于人类中这一特点是由斯芬克斯因子所决定的。当人性因子能够控制兽性因子时，人方能成为伦理之人；但当文明的人发现兽性因子，即“马与鳄鱼”，不受人性因子的控制和约束时，那么人便会受到非理性意志的驱使，导致自然情感的泛滥，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从而造成“事

1 朱利安·巴恩斯：《她过去的爱情》，郭国良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18年）引语。本文有关《她过去的爱情》的引文均来自朱利安·巴恩斯：《她过去的爱情》，郭国良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18年），下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情的悲剧”。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伦理意识在于头脑中存储的各种不同“脑文本”。这些脑文本受制于意志的影响，并反作用于意志。作为人所独有的特征，斯芬克斯因子中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变化和冲突，不仅与情感和意志的变化紧密相连，以此为表现形式，同时也影响着人的思维活动，进而影响人的伦理意识和伦理选择。由此可见，巴恩斯对于嫉妒这一主题的兴趣在于情感作用时大脑的运作，即嫉妒作用下，格雷厄姆生成相应的脑文本，使得两种因子在他身上此消彼长和相互抑制，并通过两种意志（理性意志和非理性意志）和两种情感（自然情感和道德情感）之间的博弈体现。意志和情感的伦理冲突又影响了脑文本的生成和演绎，从而影响了他的伦理选择。

纵观小说关于格雷厄姆两次婚姻以及伴侣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格雷厄姆对于婚姻和情感充满了不可协调的矛盾。在与前妻芭芭拉第一场维持十五年的婚姻中，他承认和芭芭拉的感情。但是芭芭拉理智近乎冷漠的性情让他在婚姻中丧失了激情和爱情。甚至对于他们的女儿爱丽丝，格雷厄姆坦言“爱丽丝从未激起他心中更深沉的怜爱”（6）。然而他却强调自己的忠诚，认为婚姻中的不忠是错误的，解释道在女学生的勾引下自己仍然理性并未越轨。但讽刺的是，当真正的诱惑出现时，格雷厄姆口中的错误便成了情理之中的事。在遇到热情似火的安后，格雷厄姆体验到了身体和情感功能的复苏。在第二段婚姻中，格雷厄姆的情感和身体是麻木的，无法感受到婚姻和生活带来的乐趣，而这也成为了他与安私通“合理化”的理由。我们可以看到私通者格雷厄姆和安并非没有负罪感，他们深知出轨与不忠破坏了社会认同的伦理秩序，更违背了公认的伦理准则，但格雷厄姆却不断以爱情和快乐的借口背离自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伦理责任和义务。“伦理身份是道德行为及道德规范的前提，并对道德行为主体产生约束”（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4）。在过去的婚姻生活中，尽管遭受了情感的痛苦与折磨，在理性意志的正确引导与约束下，格雷厄姆的行为尚且符合大学教师和丈夫的伦理身份与责任。然而随着婚外情的升温，格雷厄姆领略到了快乐之道迷津般的享受，他的道德情感也渐渐向自然情感转化，最终放弃其内心的道德法则。在向芭芭拉坦白出轨的事实时，格雷厄姆的反应丝毫看不出有一丝愧疚与心虚，取而代之的是对家庭的嫌弃以及如何成功摆脱芭芭拉母女的心机。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本能的作用从格雷厄姆身上流淌出的原始欲望。他渴望追求快乐，尽管在与芭芭拉交往初期中他的情欲炽热，迸发出强烈的爱意，但他不断强调与安的感情超越了情欲，使他远离了生活中的恐惧和猜忌。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却不断见证斯芬克斯因子的变化。

在经历了第一次麻木且丧失主动权的婚姻后，格雷厄姆享受着人生中第一段性自由时期，而此时他对于婚姻以及爱情的幻想实则已凌驾于现实。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述，在《她过去的爱情》中，嫉妒情感的导火索或是支点是细小、微不足道的。在芭芭拉的精心安排下，格雷厄姆与女儿进入电影院观

看安曾参演的电影《欣喜若狂》。在格雷厄姆看来，这一部电影充满艳俗的色彩和荒唐的情节。当看到自己的现任妻子出现在荧幕时，他的反应更多的是新鲜与好奇。但与女儿讨论该电影时，爱丽丝却毫不掩饰对于安的鄙夷和诋毁。在电影《欣喜若狂》中，安饰演的是一位卖弄风情的女子，或用其话而言“婊子”（36）。格雷厄姆在看到荧幕中的安时，他便已经知道芭芭拉与女儿的诡计。他一开始便意识到安仅仅是在表演，因而他的反应更多的是好奇和戏谑。但当他意识到前妻和女儿的处心积虑时，他似乎也变得不再那么自信。“她只是在表演”（31）这一句陈述事实的话对于格雷厄姆来说已经不再是内心理智情感的发声，更似安抚之言。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格雷厄姆关于安出轨的脑文本中矛盾的内容：一方面他意识到安只是在表演，并未真正与演员厮混。同时电影发生在过去，早在安遇到格雷厄姆的前几个月，她便退出演艺圈，因此这与当下他们的情感关系并无多大联系。此外，芭芭拉和女儿的用意显而易见，因而她们对于安的评价并不可信；但另一方面，他又似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电影中的情节以及安的过去让他渐渐产生了怀疑和猜忌，忍不住询问安电影拍摄的感觉以及电影中她的“意大利情人”。然而安的坦率回答并未平息格雷厄姆脑中不断滋长的情绪。

格雷厄姆在后一个礼拜中重看了三遍《欣喜若狂》，甚至为了电影影响了工作。电影这一导火索让他对安的过去产生了过度的好奇和幻想。纵使他知道安过去的男友，但如今他控制不住想象安与前男友们是否像电影中一般有过肌肤之亲，而这种揣测和想象让他觉得安是在偷情，已经背叛了他。对于自己的这种想法，格雷厄姆认识到其不合理性，然而他却无法控制。格雷厄姆对于安过往情史的执着慢慢演变成了验证安与“意大利情人”厮混的热忱。他以历史学家的“实证”精神试图为自己的嫉妒心找寻佐证。当发现无法亲眼目睹妻子与其他男演员在电影里私通时，格雷厄姆甚至认为这代表了妻子虽然在荧幕前保持贞洁，但在私下里与男演员通奸。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与电影的混淆以及对于安私通的妄想占据了格雷厄姆大部分的脑文本。随着这一负面文本的不断积累和发酵，格雷厄姆更难控制自身的兽性因子。他的大脑中不断浮现着复仇的画面：

他将巴克溺死在满是果汁朗姆酒的池子里：巴克衰竭的肺里鼓出来的最后一个泡泡在布满口水的泳池表面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最精彩的复仇在最后面……格雷厄姆环顾四周，把推土机挂上后档，然后驾着它慢慢轧过毫无生命气息的尸体，他要碾碎他的骨头，要把他的血肉碾得像酥饼一样薄。（110-113）

在这个复仇梦中，格雷厄姆俨然成为了一个凶残的杀人凶手。无论是杀人的手法抑或是折磨尸体的手段都宣泄了格雷厄姆内心积累的愤怒和妒火。

尽管他不断强调这是在梦中，但格雷厄姆丝毫不为自己萌生的杀人念头而感到惶恐，他将自己谋杀“情夫”的臆想只当作漫无边际的幻想。此时格雷厄姆的兽性因子并未得到有效地约束，并逐渐控制人性因子，侵蚀他正常的心智和情感。尽管未确定巴克或者皮特与安是否真正私通，格雷厄姆仍然无法控制自然情感，任由谋杀的念头泛滥。

然而，彼时格雷厄姆的理性情感，即道德情感，并未完全转化为自然情感，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一直处于博弈的状态，并体现在他的思忖和与杰克的“谈话治疗”中。在感受到嫉妒的情绪肆意膨胀时，格雷厄姆提出了关于嫉妒的一系列问题：首先，“为什么嫉妒会产生——不仅是他，还有芸芸众生？它是怎么产生的？”（155）；第二，“出于某些原因嫉妒是必须存在的，但它为什么还影响着过去？为什么似乎是它主导着情绪？”（156）；第三，为什么因回顾而产生的嫉妒仍在当今存在，仍在 20 世纪的最后 25 年存在呢？”；第四，“为什么这种令人嫌弃的、鄙夷的嫉妒仍挥之不去、纠缠不已？”（157）格雷厄姆嫉妒的导火索仅仅是安的电影和一些杂志图像。而这些影像刺激使他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最终释放了所有的邪恶。格雷厄姆试图为自己的情绪和失控找寻逻辑，希望理性化情绪。作为一位历史学讲师，他理应善于选择和诠释信息来源，更能分辨过去与现在的差别。然而他现在所遭受情绪带来的苦难恰恰证明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对于安的历史建构是主观甚至虚构的。为了找寻安不忠的证据，重建她的过去，格雷厄姆对于一切蛛丝马迹不做任何理性的甄别：从安参演的电影，与其搭档的男性演员的评论、电影到实证考察她所去的地方、拍摄的照片、广告、外国硬币和火柴盒等。随着格雷厄姆头脑中这些影像信息的积累，他的大脑开始运行。安和各类男演员在银幕上的调情，拍摄的各类照片等信息促进了格雷厄姆大脑中一系列关于安出轨的脑概念的形成。在他对于婚姻和爱情的伦理规则理解下，大脑不断对这些脑概念进行组合和修改，并在斯芬克斯因子组合和变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安背叛的脑文本。但显然格雷厄姆也意识到自己出现了爱情的“病症”，并为此苦恼不已。因此，在自身无法找寻答案后，他试图咨询好友杰克。

在整部小说中，格雷厄姆与杰克类似“患者”与“治疗师”的谈话出现了若干次。在格雷厄姆看来，杰克能充当“治疗师”角色的原因不仅在于他在男女或婚姻关系的经验比格雷厄姆更为丰富，更懂得如何应对这些爱情中的症候，而且小说家的职业使他能从混沌中提炼些许秩序。事实上，杰克确实提出了格雷厄姆遭受苦难的原因：

“我不知道有什么能阻止你想去看那些电影。我是说，那是在你脑子里的东西，对吧？”（94）

“从你现在的情况来看，它们确实在闹腾。因为那一批，即第二批，它们才控制我们的情绪，迫使我们踢狗杀人，上别人的老婆，投票给托

利党。”（95）

杰克关于脑子的论断可谓与麦克莱恩“三个脑袋”的论述不谋而合。在杰克看来，格雷厄姆之所以如此执着于安的去，妒火攻心，是因为他无法控制自己脑子中的“第二批”，即兽性因子，导致格雷厄姆形成了一系列安背叛和出轨的脑概念，并受制于他的非理性意志和自然情感。那如何去控制这些情绪呢？杰克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包括度假、出轨以及自慰等。格雷厄姆只实践了自慰并且毫无疗效。在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杰克作为“治疗师”的伦理身份。作为格雷厄姆和安的介绍人以及共同好友，杰克与安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恋爱关系，甚至在安主动找他聊格雷厄姆的情况时，他仍表现出对安的爱慕和留念。那么在面对格雷厄姆与安的婚姻以及格雷厄姆的情感咨询时，杰克是否也存在嫉妒心呢？从杰克在妻子苏以及安面前对于格雷厄姆的态度中不难看出，他享受着“治疗师”的身份，将格雷厄姆视为弱者，戏谑地称他为“小奥赛罗”。但与格雷厄姆不同，杰克对于自己的嫉妒心似乎拿捏得当。他享受于生活在理性主义与理想主义矛盾之间，将自己满足和平和的心态凌驾于其他情绪之上。因此，即使他依旧留念安，对格雷厄姆有着竞争者的心态，他并未臣服于嫉妒之下并形成相应的脑文本，也未让兽性因子得以控制。

但正是杰克这种玩世不恭，操控情绪和大脑的性格让格雷厄姆产生了怀疑。在格雷厄姆看来，虽然自己并非是世界上最忠诚的情人，但是他对于前妻的背叛是缘于对自由、爱情和快乐的追寻。且正因为他对安的专一和忠诚才有了现在的多愁善感；而杰克似乎对于爱情和婚姻并未忠诚。在探讨大脑对于情绪控制这一话题时，格雷厄姆不经意间地问出了关键的问题：“但是你会上，就像你说的，别人的老婆……你说这是脑子中没发育好的那部分会让你做一件事情。所以，你一定被控制做过这件事情”（97）。格雷厄姆的试探显然遭到了杰克的否定，但猜忌和怀疑的种子早已播下。对于格雷厄姆而言，如果说他“脑子中没发育好的那部分”（97）控制他的嫉妒和愤怒，那么杰克必然也会受到那部分控制干出出轨这一类事。因此，当看到派对上安与杰克的互动、亲吻时，格雷厄姆的愤怒和嫉妒之火喷涌而出。他试图从杰克小说的文本信息中找寻他们奸情的线索。相较于格雷厄姆历史教师的职业，作为小说家的杰克本应是虚构的行家里手，但讽刺的是他的文牍工作更像是历史编撰。他对于现实的依赖远远超过了该有的想象力。就此而言，格雷厄姆更符合小说家的特质，但他却混淆了真实和虚构。他试图在杰克小说中找寻“胸部”、“胸罩”以及其他敏感身体部位的字眼，并最终在杰克的政治性爱主题小说《冲出黑暗》中找到了杰克和安私通的文本证据：安痣的部位、吸烟的习惯、胸部的描述以及做爱的习惯等等。格雷厄姆“理性分析”并最终得出了结论：“杰克和安的奸情开始于1971年，他刚认识安的时候，

他和安结婚后，这两人还一直维持着关系”（210）。从怀疑、认证再到最后的确认，格雷厄姆的脑中已经储存了关于安出轨私通的一系列脑概念。即使这些信息荒诞无稽，并不具可信度，但他已经预设了结论，即安和杰克已经背叛了他。在背叛的脑文本作用下，格雷厄姆将小说中的文字影像化，脑海中不断浮现安和杰克出轨的画面。有鉴于此，格雷厄姆身上的嫉妒等一系列情感体验不仅仅是情欲的愤怒和自尊心使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不再将自己的幻想或恐惧与现实区别。换言之，作为第一段婚姻中的背叛者，格雷厄姆将自己曾经的不忠投射于安身上。这种恐惧对方出轨背叛的心理在对于变迁事物想象力的助力下不断滋长发酵，进而使他混淆了过去与现在，现实与梦境。

另一方面，格雷厄姆关于安出轨的脑文本形成后，影响了斯芬克斯因子的组合和变化。最终，在理性意志和非理性意志博弈的过程中，格雷厄姆的人性因子逐渐失去了对兽性因子的有效控制。格雷厄姆把刀刺向了杰克。在杰克恢复神智并试图做出反抗时，他不断朝着杰克心脏和生殖器中间的位置攻击刺扎。在刺杀完成后，格雷厄姆冷静地清理了现场，并舒服地喝着杰克泡的咖啡。尽管格雷厄姆曾幻想过谋杀安情夫的画面，但那时候的兽性因子显然被人性因子所压制。然而在关于安出轨的脑文本形成后，在友情和爱情的“双重背叛”刺激下，自然情感和非理性意志驱动他做出刺杀杰克的伦理选择。这一伦理选择是其相关脑文本形成和演绎的结果：一系列安私通出轨的脑概念在他对于婚姻和伦理规则的理解下，组合形成了关于愤怒、嫉妒、自卑、复仇等脑文本。尽管在脑文本的修正过程中，他也经历了兽性因子和人性因子的博弈，理性意志和非理性意志的斗争，以及自然情感和道德情感的转换，但负面的脑文本最终指导了他的行动，并将幻想的谋杀付诸实施。在结局中，格雷厄姆将安捆绑，避免与她进行眼神交流。他感到自己的脑袋空空如也，毫无念想。在自杀前，他对自己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让一切看起来像一部电影：那将会是最大的讽刺，这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不要大幕线，不要情节剧”（237）。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做出伦理选择后，格雷厄姆被压抑甚至是缺失的理性意志在慢慢苏醒。他渐渐意识到他的悲剧在于，当他认为自己能控制情绪，成为脑子的主人时，大脑已经在利用这些负面的脑文本使其成为了他的敌人。他无法控制兽性因子，害怕直面自己的自然情感，从而只能深陷其中，以自以为是逻辑和理性成为大脑和情绪的奴隶。

三、巴恩斯的文学脑文本和伦理意识

在世界文学中，以嫉妒为主题的小说可谓汗牛充栋。到了二十一世纪巴恩斯的笔下，这一主题显然有了独具特色的巴氏色彩并带有浓厚的伦理涵义。《她过去的爱情》是一部具有高度互文性的伦理性文本。巴恩斯的语言戏谑幽默，且时不时喜欢织一张互文的网，将嫉妒与其诠释方法所并置，继而对

人性各层面进行拓展和深挖，并通过讲述嫉妒的故事给读者带来道德警示和伦理启迪。

在描述格雷厄姆的脑文本的形成和演绎，以及两种情感和因子的博弈时，我们分析道，巴恩斯试图展现理性和非理性自我之间的斗争以及由本能、情感和理智三者关系失控所引发的道德悲剧。这一主题与福斯特（E. M. Forster）《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 1910）中关于“唯有联结”的主题有着意味深长的关联性。在《霍华德庄园》中，玛格丽特知道了亨利不光彩的过去，然而她选择了原谅并接受求婚。玛格丽特将婚姻这一“联结”的使命视为对亨利的救赎：“它将我们生活中的平淡与激情联结起来。如果没有这种联结，我们都是无意义的碎片，要么当修道士，要么当野兽，就像两个从未联结起来的圆弧”（Forster 159），玛格丽特不断强调将看不见与看得见的“联结”，将生活中的“诗性”与“散文”所联结。事实上，这种“联结”正是弥合理想世界和现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所做的努力，也是玛格丽特通过婚姻在理想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的调和。相较于玛格丽特的原谅和协调，格雷厄姆执着于安“不光彩”的过去，深陷于理想主义与理性主义的鸿沟之中，也因此无法联结“修道士”和“野兽”两个圆弧。如果说“联结”的思想反映了福斯特人文主义的社会理想；那么在巴恩斯笔下，“联结”则展现了他通过隐匿在亲密关系中的嫉妒母题对头脑的伦理功能和斯芬克斯因子的探讨。如果没有了“联结”，那么我们只能走向“修道士”或“野兽”两个极端。然而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是不可分的，只有两者结合且人性因子控制和约束兽性因子时，人才能成为伦理的人，构成完整的人格。小说最后一章的标题“马和鳄鱼”正是对麦克莱恩的论断以及“野兽”的回应。当格雷厄姆拿起刺刀刺向杰克时，他做出了伦理选择，在罪恶中越陷越深。头脑于是丧失了理性，成为了格雷厄姆的敌人。

格雷厄姆关于安出轨和背叛的脑文本来源于他对“事物、对世界的感知、认知和理解”（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口头文学与脑文本” 11）。就格雷厄姆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社会背景而言，彼时的英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以披头士为代表的摇滚乐大面积走红，因过多性爱描写而被禁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也已经解禁，“反叛”席卷了英国。这一场“性革命”声称要通过普通人的性解放颠覆整个蔑视人性的社会，所造成的文化冲击，不亚于这个世纪出现的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动荡。诞生于此背景，《她过去的爱情》却是一部反思“性革命”的小说，在采访中，巴恩斯坦言：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它是一本反 60 年代的书。……维多利亚女王仍然当权，披头士乐队接踵而至，突然间，每个人都开始和其他人睡觉，并通过此得到许多的治愈。正如许多人所看到的那样，这是英国性史的粗略计划。而我只想，它并不是那样的；永恒不变的是人类的心灵和

激情。至于谁与谁做了什么事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变化。(McGrath 21)

不难看出,《她过去的爱情》刻画的正是在性解放时代下催生的病症,即嫉妒。在巴恩斯看来,真正且永恒的解放不仅需要打破禁欲观,它更需要打破内外的双重枷锁,继而使人性达到情感与欲望统一,上升至伦理自律的高度,并最终获得高度完善以及觉悟的人性。格雷厄姆的伦理选择不仅受到了脑文本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巴恩斯的伦理意识。巴恩斯通过“回忆性嫉妒”的荒诞讲述了一场由兽性因子控制下导致的悲剧。在此,他通过描绘格雷厄姆陷入的头脑困境,展示其只能盲目地、片面地面对这种悲剧,并以此将嫉妒作为探讨人性和伦理的突破口,赋予了它深刻的社会意义、哲理意义和伦理意义。读者感知的不仅仅是爱情中的占有与愤怒,更多的是在格雷厄姆的脑文本与斯芬克斯因子互相影响下,意志和情感的伦理冲突及其带来的伦理启迪。

正如巴氏其他著作一样,《她过去的爱情》是智性的。它将意志、情感、伦理和人性进行剖析和分解,钩沉人性曲折幽微。巴恩斯的通达与聪慧在于他并不陷入虚无和绝望。人性是伦理选择的结果。尽管我们无法将人协调至完全理性的位置去规避痛苦和弱点,但正因为这些缺陷和弱点促使我们找寻救赎的出路。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而言,文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7)。就此而言,通过书写嫉妒,巴恩斯揭示了伦理道德之于人类生活的规范和指引作用。

Works Cited

- 朱利安·巴恩斯:《她过去的爱情》,郭国良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18年。
 [Barnes, Julian. *Before She Met Me*. Trans. Guo Guoliang. Shanghai: Wenhui Publishing House, 2018.]
 Childs, Peter. *Julian Barn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11.
 Forster, E. M. *Howards End*. New York: Penguin, 2000.
 Freiburg, Rudolf. “‘Novels Come out of Life, not out of Theory’: An Interview with Julian Barnes.”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a Postmodern Author?*”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English Writers*. Ed. Rudolf Freiburg, Jan Schnitker. Münster: Lit Verlag, 1999. 39-66.
 Guignery, Vanessa. *The Fiction of Julian Barnes: A Reader's Guide to Essential Criticism*.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Guppy, Shusha. “Julian Barnes: The Art of Fiction, no. 165.” *Paris Review*, 157 (Winter 2000).
 McGrath, Patrick. “Julian Barnes.” *Bomb* 21 (Fall 1987): 21-23.
 Millington, Mark I. and Alison S. Sinclair. “The Honourable Cuckold: Models of Masculine Defenc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9.1(1992): 1-19.

Montrose, David. "Julian Barnes." *Contemporary Novelists*, 4th edition. Ed. D. L. Kirkpatrick. London: St James Press, 1986

聂珍钊: “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 《外国文学研究》5(2017): 26-34。

[Nie Zhenzhao.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Brian Text and Brian Concept in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2017):26-34.]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 《外国文学研究》1(2010): 12-22。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2010): 12-22.]

——. “文学伦理学批评: 口头文学与脑文本”, 《外国文学研究》6(2013): 8-15。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ral Literature and Brain Text."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2013):8-15.]

聂珍钊, 王永: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脑文本: 聂珍钊与王永的学术对话”, 《外国文学》4(2019): 166-175。

[Nie Zhenzhao and Wang Yong.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Brain Text: Academic Dialogue Between Nie Zhenzhao and Wang Yong." *Foreign Literature* 4(2019): 166-175.]

赫尔穆特·舍克: 《嫉妒与社会》, 王祖望、张田英译。台北市: 时报文化, 1995 年。

[Schoeck, Helmut. *Envy: A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Trans Wang Zuwang and Zhang Tianying. Taipei: Times Culture, 1995.]

Smith, Amanda. "Julian Barnes." *Publishers Weekly* 236/8 (3 November 1989): 73-74.